

国 外

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

(第三辑)

华中师范学院辛亥革命史研究室 编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1984年8月 武汉

257.09
3

K252.07
5
2:3

目 录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	(日)久保田博子 (1)
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	(苏)尼基福洛夫 (23)
评中村义先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	(日)清水稔 (46)
章炳麟李大钊思想之研究·····	(日)近藤邦康 (62)
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澳)冯兆基 (79)
董野长知给中村弥六的书信电报介绍 ·····	(日)久保田文次 (91)
滔天是孙文与黄兴初次见面的仲介人吗 ·····	(日)中村义 (96)
《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解说 ·····	(日)久保田文次 (103)
论目前西方的中国地方史研究趋向 ·····	(美)艾恺 (108)
附录一 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例会记录	
附录二 荷兰的汉和学研究	
附录三 台湾“辛亥革命研讨会”记略	



B137255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

——兼论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

(日) 中国研究所 久保田博子

前 言

宋庆龄的一生，是完全值得与以辛亥革命为开端的中国革命历史相提并论的。她诞生在孙文的身旁，成人后又与他重逢，而后终成眷属，共同投身革命。在孙文逝世后，她更是牢记“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继承他的遗志，坚持了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一生奋斗不息。她一方面全身心投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选择了达到革命胜利的正确路线；另一方面，不断地向全世界呼吁和宣传中国革命的正义。新中国成立后，她又担当起国家建设的主要领导职务。她决不仅仅是孙文的遗孀。她显示了她自己伟大的存在。宋庆龄存在的如此伟大的意义，究竟从何而来？笔者试图重新估价她与中国革命的最初关系的意义。也就是试图阐明她与孙文的结合，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而她自己又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家；然而这一切又促进了孙文晚年的新三民主义的形成。这篇小论，就作为阐明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一)

一般都认为宋家和孙文，即宋庆龄之父宋嘉树与孙文相识，是在一八九四年。这是在一八九四年，孙文与香港“辅仁文社”的全体成员联名向清朝政府上书请愿，要求实行立宪新政，经过上海、北京，向天津的李鸿章的幕案递交意见书，但以失败告终。此后，孙文等人决心推翻清朝政府，孙文赴美国夏威夷组织“兴中会”。在这一时期，清朝政府在日清战争中节节败退，民心动摇，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革命同志以为“良机不可失”。要求孙文回国。孙文改变了旅美计划，于一八九五年回到了香港。当时写信请求孙文回国的，正是宋嘉树①。因此，可以认为孙文与宋嘉树的交往是开始于一八九四年。

但是，野泽丰先生写道：“宋先生是一位传教士。他在美国刻苦学习之后回到上海，由出版圣经而治下家产，后来他创办了商务印书馆。他很早就开始支持孙文的革命活动”。②由此可见宋、孙二人在更早以前就有了交往。莱恩·夏曼在《孙逸仙的一生及其意义》一文中，在有关上述事实的部分中说：“这封信，是一位自称姓宋，自称是革命者的上海的一个友人写来的。”③可以称为“友人”，而且代表同志的立场，写信催促孙文“赶快回国，立刻发起革命”，这表明他们二人在此事之前的亲密的交往和非同一般的关系。

那么，在一八九四年之前，他们的结识又何以得知呢？夏曼写道：

“当孙逸仙还在檀香山就学的时候，另一个与他年龄相仿，喜好冒险的中国青年，于一八八〇年的一天，在一条小

型商船上，竭力向船主恳切地诉说着什么。^①后来，这位船主将这位青年介绍给了美以美教会的一位牧师。牧师给他洗礼名查尔斯·琼斯·宋^②，并让他得到了进入北卡洛尼那的托里尼特单科大学学习的机会。在这里学习了一年之后，他又到特勒西州纳西维尔的万达维特大学的神学部求学三年，即从一八八三年学习到一八八五年，而后回到中国，定居上海。”

埃米利·哈恩在《宋氏三姊妹》一书中第三章《查利·宋的一家》的开头写道：“查利于二十三岁时回国，大约一年后结婚。”^③据此，可以断定宋嘉树是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六年回到中国，定居上海的。

当宋嘉树在上海有了家庭时，孙文正在香港的西医书院就读，经常与好友杨鹤龄、尤列、陈少白议论革命之事，被人称之为“四大寇”。孙文的同乡，后来与孙文一同参加广州起义而牺牲的陆皓东，也常从上海来香港，与他们四人畅谈。^④不久，到一八九二年七月，孙文在西医书院毕业，在澳门开业。一八九三年回到广州行医，一方面秘密地进行着正式革命的准备。

孙文的一九一二年的书简中记载着一八九二年已与宋嘉树有过深交的事：

“宋嘉树早在二十年前就与陆皓东烈士和我畅谈革命，且二十年来始终未变。但他不求为世人所知。上海的革命取得如此的成果，确实得助于宋君之力。他从事教会与实业，是密秘地传播革命道理的“隐君子”。我此次解职来沪，重会旧友，回想与陆皓东等三人常常开怀畅谈之往事，不禁感慨万千。现在他执意留我住在他家，常与我回忆往事，追忆陆皓东烈士。”^⑤

若通过书简中“二十年前”这个数学来推算，那是一八九二年。当然，“二十年前”也可能是个大概的数字。如果有事实根据可以证明“二十年前”这个数字是偶尔数一数而得之，那么如前所述，有文字记载说：一八九二年陆皓东由上海到广州，与孙文等革命同志有过来往。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孙文和宋嘉树之间，是由陆皓东来联系的，那么宋孙二人一八九二年相识并互相协助的说法就可以成立。作为这个推断的依据，还有以下事实：

(1) 宋嘉树一八八六年定居上海的情况如前所述。而一八九二年以前由上海到广州，参加了孙文等人的革命活动的陆皓东与孙文是同乡，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人。其父在上海经商，治得家产（皓东九岁时逝世）。皓东本人也在十七岁时（一八八五或一八八六）到沪，在电报学堂就读。毕业后，就业于芜湖电报局，当上了领班（主任），直至他二十三岁。即一八八五或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陆在上海生活并活动。可以推测宋、陆之间有过相遇、同感和交往的可能性。

(2) 宋、孙、陆三人都是广东人，都是基督教教徒。

(3) 孙文初次到沪的时间，因为目前还没有关于一八九四年北上（孙与陆同行）之前的事实文献，所以不得而知。但宋嘉树去广州，通过陆皓东与孙文联系，这是可能的。

(4) 宋、孙的交往也有可能是通过郑士良的介绍而开始的。⑨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与孙文的交往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的交往的实质与其说是革命运动中的同志关系，不如说是宋对孙的革命活动给予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他们之间是秘密的而又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夏曼说，

“孙逸仙和查尔斯·宋成为密友时，宋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孙常常逗他的孩子玩耍，并在最初的革命计划中，对宋的支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⑩埃·米·利·哈恩在谈到孙与宋家的关系时也说：“孩子们把孙当作叔叔来看待”，“孙每每来到上海，都住在宋家。孩子们把他看作自己家中的一员。”^⑪

但是夏曼和哈恩所记述的孙与宋家的子女相识的时间似乎有些出入。如果如夏曼所说，宋嘉树与孙文初交时，宋已经有五个子女，那么宋庆龄的出生年月就与宋嘉树、孙文的相识的时间之间就有矛盾之处。

宋庆龄的生年从来被认为是一八九〇年，但最近仁木富美子在《与宋庆龄会见之后》中说：“……宋庆龄一八九五出生在宋家。”当时仁木问道：“您是一八九〇年生的吗？”“不。”“那么您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呢？”冯翻译无可奈何地说：“她老人家说已经忘了。”“我把我结婚的时间告诉你吧。”宋庆龄对仁木说，“那是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事了。”^⑫宋庆龄结婚时是二十岁，那么根据上述时间推算，生年就应该是一八九五年。

哈恩对一九〇〇年的情况有如下记述：“一九〇〇年孙逸仙从欧洲返回日本时，未来的孙夫人正要开始学校生活。”^⑬这与上述关于生年为一八九五年的推论是相符的。当然，中国当时没有义务教育制度，尤其是女孩子究竟从几岁开始上学，是没有确切根据的。但宋家是基督教徒，家庭生活完全欧美化了。因此多半与美国人一样，五、六岁就可能上教会学校了。

由此可见，宋、孙的交往和孙文与宋家的孩子们的交往并不完全是在同一时期。宋嘉树与孙文的交往，使孙文与宋

家子女结识。并且父辈们满怀着变革的志向，他们的谈话中洋溢着民族主义的热情，自然深刻地影响了孩子们的情感和思想。

(二)

如果宋庆龄的生年为一八九五年，孙文领导的第一次起义——广州起义正巧就发生在这一年。而且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孙文在美国，而宋庆龄也正在美国。埃米尔·哈恩说：“在乔治亚，革命成功的消息，使宋庆龄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篇报导。这篇报导登载在一九一二年的学校校刊上。”并全文介绍了宋庆龄的这篇报导。这就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发行的“威士雷恩”报（“美以美会”报 译者注）上的论文《二十世纪的最大事件》。^⑭

在文章中，宋庆龄写道：

“五个月前，我们的最大胆的梦想中也没有过‘共和国’的概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连初步的‘立宪政府’的提法都不胜怀疑。但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工人，心灵深处无不燃烧着反清怒火。暴虐的清朝宫廷以及那些贪官污吏正是饥荒、洪水以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表现的倒退和痛苦的根源。正是这种压迫，成了引起革命的最直接的原因。”

文章论述了中国爱国人民的反清情诸，以及“剪辮运动”中所现表的反抗精神，认为这次革命的性质为民族主义革命，评价它为民族革命。外一方面，引人注目的是，文章肯定了“共和国”代替“立宪政府”而出现的伟大意义。文章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章的标题“二十

世纪的最大事件”也是指共和政体在中国的诞生。并且提出了“压迫引起革命”的观点，把中国出现的革命事件看作政治革命、群众运动。早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年仅十七岁的宋庆龄在远离祖国的美国，能具有如此卓绝的见解，实在是不同凡响。

由此可以联想到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孙文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他在讲演中说：“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驱逐满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但从推翻君主制度的意义来看，是政治革命。这二者又是绝不能分段进行的。”^⑤耐人寻味的是，宋庆龄的论点似乎是对孙文的这一段革命理论有所理解而提出的。当时，孙文和宋庆龄并未开始交往。但宋庆龄似乎是通过父亲得到了阅读“民报”的机会，从而了解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并了解孙文的革命理论的。这一点，从宋庆龄当时的年龄和她的处境来看，并不超出人们的想象。

当然，辛亥革命的现实，不会像当时宋庆龄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进展；相反会反复遇到各种严重的挫折。但当辛亥革命最初成功的消息传来时，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宋庆龄说：“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许多人英勇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这两大权利。这权利是不能再次被剥夺的。但是还需要得到‘博爱’。”科尔格特大学的克洛修学部长说过：“博爱是自由和平等的基础。因此二十世纪的目标是培养得到博爱的理想。”宋庆龄引用了他的话，并论述道：“博爱，是人类之爱中还未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人类之间兄弟般的爱，自由就没有基础；如果人们不能兄弟般地相处，平等也只是一梦。”

革命，不仅要争取自由和平等，而且要以博爱为目标。

博爱必须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基础。正是这种实行博爱的共同理想，成了后来宋庆龄与孙文接近并共同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成了决定他们的一切行动的起点和关键。人们在青年时期定下的志向，就象人生道路上的潜流，一有机会，就会高涨起来，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自由与平等的基础是博爱。博爱是最重要的课题。”——宋庆龄的这种观点证明了青年时代的宋庆龄所具有的革命家的气质。

“博爱”，从字面上看可能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伪善的，而且这个概念本身也没有什么新鲜意义。但是宋庆龄的博爱思想，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因为它和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孙文的民生主义——大同思想一样，是作为中国的近代思潮而重新提出的一种新的思想。

在“民报”一周年纪念的讲演中，孙文所提出的民生主义，“目标是解决因贫富差别增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它的根底，是因为我在欧美的生活体验中，感到单是增强生产力，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不如把力量放在公平分配社会财富之上。”①⑥它的具体方法是“平均地权”。而且在当时的民生主义之中，虽然还不大明确，但已有了后来的“节制资本”的设想，各种社会福利的思想也已经形成了。①⑦无论如何，由当初的三民主义发展到一九二四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了新的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尤其是在民生主义方面的观点、思想的发展，与宋庆龄关于博爱在革命中的位置的观点，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孙文的手迹中也有“博爱”两个大字。虽无具体的根据可查，但可见它与宋庆龄的博爱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革命中重视博爱的思想，一直贯彻到后来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她所从事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中。

综上所述，我们从宋庆龄十七岁时的论文，¹可以看到她有着革命家的天赋，可以看到她献身于革命的伟大人生的开端。

(三)

多年来，研究孙文的人们对他和宋庆龄的结婚日期有多种说法，但一直不能下定论。直到前面提到过的仁木富美子问过宋庆龄本人，才明确了这个日期是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关于这一点，根据《莫里森书简集》第二集所收录的关于孔祥熙的史料，以及日本外务省文件中关于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前的《孙文的动向》，可以认为孙宋结婚的日期为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五日。^⑮

成人后的宋庆龄和她父亲宋嘉树的朋友孙文，是怎样再度相逢乃至结合的呢？

宋庆龄在一九一三年春天威士雷恩大学毕业后，曾给她的老师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信中说：

“我们不久就要踏上归国的旅途了。此地有一位崇拜孙博士的人士托我带给他一盒加利弗尼亚的水果。而且，我还将作为一个幸运的使者，带给他一封私人信件。”^⑯

由此可见，宋庆龄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会见孙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她所说“私人信件”一事（“……作为一个带给他私人信件的使者，我还感到很自豪……”），宋庆龄去会见孙文时，一定有她自己的打算。这件事，是孙、宋结婚的积极意义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宋庆龄投身于中国革命，自始至终保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证据。至于宋庆龄在这次重逢时想要向孙文表明的，正是她“要为革命贡献力量”

的决心。这一点在仁木富美子为《宋庆龄选集》日文版所写的译者后记中有所论述。柯尔内利亚·斯潘塞也有记叙：

当宋庆龄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说过：“中国沉睡者，可是孙文却醒着。”家里人听了大为震惊。稍稍长大了些，她又说：“我决心象他那样生活”。当然，她是决心要象他那样献身于革命。中国革命召唤着她。她当时并不大明确那是什么形式的革命，但她决心投身于一天天、一月月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之中。

而且，他们结婚后的生活情况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宋庆龄给她在美国的同学的信中谈到了她婚后的生活：

“这是一种尽可能简单、朴素的生活。因为我俩都不喜欢那种多余的仪式和礼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多地帮助我的丈夫处理些英文信件。我的法语也大有进步。最近，我已经能读法文报纸。翻译一些简单的信件时也可以不用辞典了。对于我来说，结婚，简直就象是进入一个新的学校一样。不过，用不着通过那些讨厌的考试罢了。我想你一定能理解我的意思吧。”^{②①}

哈恩也在引用这段话后评论说：“与终日忙碌的孙文结婚，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确实是‘象进入一个新的学校一样’。”^{②②}由此可以想见，早早结婚且为协助孙文而刻苦学习外语的宋庆龄当时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因此，宋庆龄与孙文的再度相会，是由于宋庆龄本人追随革命的坚定信念决定的。他们的结合是必然的。

他们重逢乃至结婚时，是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呢？这个问题对于考察宋庆龄给予革命家孙文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具体在怎样的时期，怎样重逢的呢？

下面列举一些有关这一时期情况的记叙：

(1) 埃米利·哈恩说：

宋庆龄一九一三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上海)，看到自己的家庭已陷入了困难的政治旋涡中。姐姐宋霭龄当了孙博士的秘书；父母担任铁道委员会(The railway Commission)的出纳来支持孙文。在不可避免地袁世凯断绝关系之前，宋庆龄参加了孙文的“北上团”。……孙文作为全国铁路督办(Director of Railways)，按照自己的计划四处旅行、演讲。宋庆龄视他为英雄，非常敬仰他。②

“孙文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到全国各地去演说。六月提出全国铁路计划；两个月后，应袁世凯之邀入京；九月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③

上述孙文的“北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即一九一二年四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后至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遭到暗杀时为止所进行的几次旅行中的一次。但是在几个有关文献中所记随行人员名单中没有宋庆龄的名字。只有秘书宋霭龄的名字。④宋霭龄是宋嘉树的长女，宋庆龄的姐姐。她在一九一二年一、二月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时开始，就是他的英文秘书。哈恩所记随同“北上”的，不是宋庆龄，而是秘书宋霭龄。但是这个时期，宋庆龄已经回到了中国，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2) 柯尔内利亚·斯潘塞说：

宋庆龄是一九一三年威士雷恩大学毕业的。毕业后，马上和她的同学一起回国了。……她在横滨一上岸就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沉回忆之中，她知道是孙文亲自和另一个青年来接她。但她含而不露，把无比的激动深深地埋在心里。这时，那位年青人跑上前来，说：“我是你的姐夫孔祥熙。我们在这里消夏。……你记得孙中山博士吗？”“哦，记得，

记得。”……啊，这就是那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啊！她无限崇敬地望着他：孙文的眼皮上已有些皱纹，脸色有些苍白、憔悴，比过去苍老了。”^{②5}

这本《宋氏三姐妹》中的描述，形式是虚构的，但是素材是立足于事实的。其真实程度如何，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是在日本的横滨见面，而时间是在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之后的夏秋之交。当时孙文流亡日本，处于憔悴的状态中。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3）莱恩·夏曼说：

“一九一三年庆龄回到奥连特之前，她所衷心向往、寄与了无限忠诚的共和国已经‘触礁’并‘龟裂’。由于革命受到挫折，她自己的家庭会陷入怎样的困境呢？她到达日本之前不得而知。她的父亲筹借资金，资助了他的老朋友孙文。由于孙文等人的计划受挫，他——查尔斯·宋也成了亡命日本的人员之一。他和长女宋霭龄一起住在东京。宋庆龄就在这时回到家人身边，并且加入了那群牢骚满腹、不无失望情绪的流浪革命家的行列。她的姐姐当时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后，庆龄为了孙逸仙而接替了姐姐的秘书工作。（当时孔祥熙是在东京旅日中国学生YMCA中工作。）”^{②6}

从这一段记叙也可以看到，宋庆龄离开美国，是在一九一三年。她到达日本时，孙文以及他的同志、庆龄的父亲、姐姐都流亡在日本。她加入了他们，而且后来因孙文的原秘书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婚，她接替姐姐的工作，成了孙文的秘书。

根据上述三者，宋庆龄于一九一三年大学毕业回国，这一点是一致的。但是关于她此后的经历就各说不一。哈恩的

说法是：她回到了上海，会见了孙文，一同北上，过了一段普通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第二次革命开始后，由于上海陷入袁世凯军队的统治，宋家迁到日本。先在神户落户，而后移居东京、横滨，在那里逗留了约两年时间。^{②7}但斯潘塞的说法是：宋庆龄由美国到了日本横滨，是孙文和她的姐夫孔祥熙去迎接的。关于孔祥熙结婚一事，在孔的朋友——北京YMCA的美籍文书R·R·格利——给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顾问G·E·莫里森的一封信中提到过。这封信是孔祥熙为了请袁世凯政府“谅解”他，拜托格利给莫里森写信，请求莫里森了解他的立场的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涉及他和宋霭龄结婚的事：

“孔在东京YMCA工作时，认识了瑞吉娜·宋(宋霭龄)，一九一四年九月与她结婚。一九一五年春天回到中国，定居山西省大谷县。一九一五年九月生下一个女儿。”^{②8}

这证实了孔、宋结婚是一九一四年九月。因此，斯潘塞认为孙、宋重逢的时间是一九一四年九月以后。又根据夏曼的说法，第二次革命后，宋嘉树和宋霭龄流亡在日本。宋庆龄在回国途中和他们会合，加入了孙文及其他革命家的团体。孙文等人流亡日本的时间，根据《国父年谱》、《孙中山年谱》，正是一九一三年八月。当孙文到达神户时，由于袁世凯已与日本政府联系要通缉孙文，沿路搜索严密，后来派人设法争取了当时的山本内阁的默许才得入境，九月才到达东京。^{②9}因此连当时的老干部到达横滨时，孙文都没有出头露面去迎接。所以如果不是非常重要而事先约定的，孙文亲自去横滨接宋庆龄是不可能的。

在此笔者试根据日本方面的资料、外交史料馆的外务省文件，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的《孙文的动向》等，来确定宋庆龄和孙文会见的时间。

△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宋嘉树外出，十时二十分返回。十一时十分再次外出。（声称他的妹妹从美国来，要去横滨迎接。）

△八月三十日晚“九时五十分宋嘉树同两个女儿返回。”

△九月一日“下午二时三十分，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姓名不详）来找宋嘉树。同时六时二十分宋嘉树的女儿二人同上述男孩共三人离开稳居处乘七时由新桥发车的火车去神户，准备由神户去上海。（上述男孩是宋嘉树之子。）”

△九月四日“孙文的秘书宋嘉树二日去横滨，翌日去神户。”

△九月九日“下午十一时神户俄利安塔尔饭店艾林森来电。”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五十分，宋家姊妹带着中国随从来访。”

根据这个记录，宋庆龄于一九一三年春天毕业于威士雷恩大学，在回国途中经过日本横滨。此后的经过，将前述三种说法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得出最接近于事实的判断。即宋庆龄于八月二十九日到达横滨，宋嘉树亲自到横滨迎接；三十日，宋庆龄同父亲、姐姐（宋霭龄）一起回到父亲的住处（东京的神田区）。九月一日，弟弟宋子文来看她，姐弟三人准备一同由神户去上海，但未成行，又返回东京。九月十六日，与姐姐宋霭龄一同拜访了孙文。

可能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正是宋庆龄和孙文重逢的日子。可能就是在这一天，宋庆龄将受托从美国带回的礼物交给了孙文。他当时正因第二次革命受挫而流亡日本，处境极其困难。但就在此时，宋庆龄向他表示了“愿为革命尽力”的决心。

根据“外务省文件”中《孙文的动向》，宋庆龄与她姐姐宋霭龄（当时是孙文的秘书）一同在九月份内频繁出入孙文住处，共有七次之多。夏曼也说过，宋庆龄与流亡日本的父亲、姐姐住在一起，参加孙文等革命家的活动，常接受联络员之类的任务。

在九月二十五日有过“宋家姐妹来访”的记录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发现宋庆龄来访，只有宋霭龄几次来访的记录。可能这段时间庆龄回国去了。第二年即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开始有“宋爱林的姐姐来访”的记录。三月二日又有“宋爱林姐妹来访，十分钟后离开。”的记录。三月二十八日有“孙文腹痛，上午十时宋爱林和妹妹一同来护理，下午四时妹妹离开”的记录。其后姐妹又频繁来访，通常二、三个小时后才离开。可是九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十月二日、五日、六日、七日、八日、十三日，宋庆龄不是与姐姐同来，而是同父亲宋嘉树来访，而且逗留时间较长。这与上述R·格利给莫里森的信中所提到的一九一四年九月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一事是相吻合的。九月，因为姐姐霭龄与孔祥熙结婚，所以宋庆龄大概从这个时期开始，代替姐姐当了孙文的英文秘书。此后，在“十月一十七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宋嘉树、宋庆龄二人来访。因孙文不在，四时五十分离开。”此后，又有一段时间不见宋庆龄来访。孙文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和第二年即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四日给上海的“罗莎蒙德·宋”寄过挂号信。可见宋庆龄在此期间回国了。同年三月二十七日，孙文用汽车接回了由上海来日的宋庆龄。从此又有宋庆龄频频来访的记录。霭龄也经常和她同来。六月二十一日来访后，又不见她来了。孙文于六月二十八日“给上海的宋嘉树寄挂号信一封”，八月三日“给上海罗莎蒙德打电报